

[耳听八方]

黑龙江：

开展农产品
全程可控生产方式试验

黑龙江省农委近日下发《2015年优质高效农业试验示范推广实施方案》，计划对试验示范推广的有机水稻、有机大豆、有机杂粮杂豆和绿色蔬菜(食用菌)生产进行全程质量安全控制,做到产地环境有监测、技术操作有规程、生产过程有记录、产品质量有检验、产品上市有标识、质量安全有追溯。黑龙江省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,加强质量监管是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的重要保障,黑龙江省将采取行政监管和示范推广实施主体自控相结合的形式,健全农产品质量检测监测体系,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。

北京：

农业去年节水
近半亿立方米

北京市 2014 年开始实施粮经、蔬菜、畜牧、水产四大节水工程,建立 100 个粮经、蔬菜高标准农业节水示范区,已实现节水 4559 万立方米。据统计,2014 年北京蔬菜集约化育苗量达到 1.8 亿株,占全市蔬菜生产育苗的 10.6%。今年,仅温室、大棚集约化育苗量达 1.57 亿株,可节水 15.7 万吨。按照北京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规划,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,每亩每年用水不超过 500 立方米,大田作物每亩每年用水不超过 200 立方米,果树林地每亩每年用水不超过 100 立方米。在这一额度内,节约了会给予适当奖励,超额了就要照章收费。据了解,今年北京还将增加 300 个智能用水监测点。

辽宁：

出台落实政策
促进农产品流通

随着《辽宁省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案》的实施,辽宁省将陆续建成社区菜店、周末蔬菜直销市场等零售网点,这些建设自然需要用地。基于此,近日,省国土资源厅出台落实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发展的一系列用地政策,并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建立重点项目用地审批绿色通道,加快审批进度,提高审批效率,提升用地保障服务水平。辽宁省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案提出,到 2017 年末,全省建设改造社区标准化菜市场 1000 个以上,社区菜店、连锁生鲜超市等各类农产品零售网点 1 万个以上,基本建成市民 15 分钟买菜商圈。在这一背景下,省国土资源厅出台了新政,统筹规划,合理安排农产品流通业发展用地。

新常态下农民的收入增长要有新成效

[封面人物观点]

专家简介

张红宇

农业部
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

[核心提示]

当前,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,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、内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,农民增收越来越受到国民经济和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深刻影响,持续增收有机遇,但也有压力和挑战。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中国要富,农民必须富,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,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。

文字整理/王平

【 新常态下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分析 】

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促进农民增收必须适应新的发展环境,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,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。新常态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变化,对农民收入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

一是家庭经营收入保持平稳。一方面,土地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,以及节本降耗等技术的应用,将有利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,由此带来规模化产生的规模收入、结构调整产生的效益收入、成本降低而增加的收入等;另一方面,随着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,农产品市场需求走弱,价格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。受成本“地板”和价格“天花板”的双重挤压,农户务农种粮收益有限,比较

效益较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。

二是工资性收入增幅趋缓。新常态下,农民工数量增长的速度在减缓,工资增长的幅度在下调。从数量增长来看,2011-2014 年,农民工外出数量分别增长了 1055 万、983 万、633 万和 501 万,增幅逐年下降;从工资增幅来看,近几年增幅下降表现得更为明显,2012 和 2013 年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长分别为 16.3%和 16.8%、2014 年仅增长 9.8%。今后,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进一步放缓,在经济增速放缓、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,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水平增长也将受到一定影响。

三是转移性收入增长面临挑战。2004-2013 年,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从 96.8 元增加

到 784.3 元,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 3.7%上升到 8.8%,对带动人均纯收入增速上升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也要看到,在经济新常态下,国民经济增速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,在这种背景下,继续以直接补贴等形式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面临较大的压力,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,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。

四是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较大。近年来,受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水平提高、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、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,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,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特别是局部地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源。从长远来看,随着今后农村产权市场不断完善,农民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

【 国民经济发展与全球农业一体化的深刻影响 】

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,影响农民收入的外部环境和内生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,农民收入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。新常态下观察农民收入,要深刻认识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影响,把握农民增收的动力源和着力点。

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,经济增长速度快,农民收入增长就快;反之,农民收入也相应地减缓。但也要看到,在新常态下国民经济发展正在经历深刻调整,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高速区间,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14 年我国 GDP 增速为 7.4%,低于 2013 年 7.7%的增速,更低于 1979-2013 年 9.8%的平均增速;财政收入为 14.0 万亿元,比 2013 年增长 8.6%,增速创下 1992 年以来的新低,连续 3 年低于 1979-2013 年 14.5%的平

均增速。因此,在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上,必须有历史的耐心,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,下决心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,继续维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好势头,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,最终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。

全球化给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。我国农业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诺,取消了数量配额、许可证等所有非关税措施;关税和关税配额制度成为调控农产品贸易的唯一手段;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仅 15.2%,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/4;关税形式单一,实施税率与约束税率同一;棉白糖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 65%。除一些岛国和个别农业规模大竞争力很强的国家外,其他国家农产品关税水平都比我国高。总体上看,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农产品贸易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,面临的

竞争压力正在不断加大。

农产品价格方面,综合考虑国际国内供求形势等因素,预计 6-8 年后可能突破配额外进口到岸税后价。大豆、糖料、猪肉、牛肉、羊肉等进口敏感产品,价差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。大量进口国外低价农产品,使国内价格既不能随需求的拉动而相应提高,也不能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而相应上升,进口价格形成了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的“天花板”。一些产业的比较效益因此不断下降,农民通过价格获得的收入受到影响。农业补贴方面,我们在加入 WTO 时承诺“黄箱”补贴上限不超过农业产值的 8.5%,现在对棉花等产品的特定补贴已经逼近黄线。我们还面临资源环境和生产成本这“两个地板”的约束,农业生产成本上升,资源环境承受很大压力,依靠投入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。

【 把握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源 】

化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,加大政策扶持力度。与此同时,有两个长期趋势值得重视:

一是从农民增收趋势看,兼业收入还将长期存在。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使农业兼业化经营成为普遍现象。据全国农村观察点调查,1993-2013 年,纯农户比重由 49.90%下降到 39.65%,非农户和兼业农户比重已达 60.05%。兼业农户产生兼业收入,随着农业份额在整个经济增长中逐渐下降,农业部分地被农户兼业经营不可避免,这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来源渠道,提高收入水平,另一方面也对农业资源在各种类型农户之间如何优化配置、提高农业部门效率提出了长期的挑战。二是从农民收入的动力源看,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,具体的要解决三个“一亿人”问题,即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,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 and 城中村,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。“三个一亿人”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。首先,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,增加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,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总量;其次,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水平提升;第三,通过城乡资源均衡配置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

化等方面改革,逐步解决进城农民及其随迁家属的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问题,有利于降低农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,间接提高农民收入。总的来看,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,必须内外结合、多轮驱动,充分释放各方面积极因素,努力拓展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源。

把握不同区域农民增收的着力点我国各地农业资源禀赋、生产方式不一样,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,与此相应,不同地区农民增收的重点也各不相同。比如,在东北地区,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粮食生产收入对农民增收有重要影响;在河南、安徽、重庆等劳动力转移较多的地区,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增收的贡献率较高。因此,必须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,明确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和着力点,沿海发达地区要更加注重挖掘财产性收入、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潜力;传统农区和中西部地区应更加注重拓展农业内部增收空间,提高农业产业效益,同时吸引沿海地区产业转移,鼓励农民创业,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。

